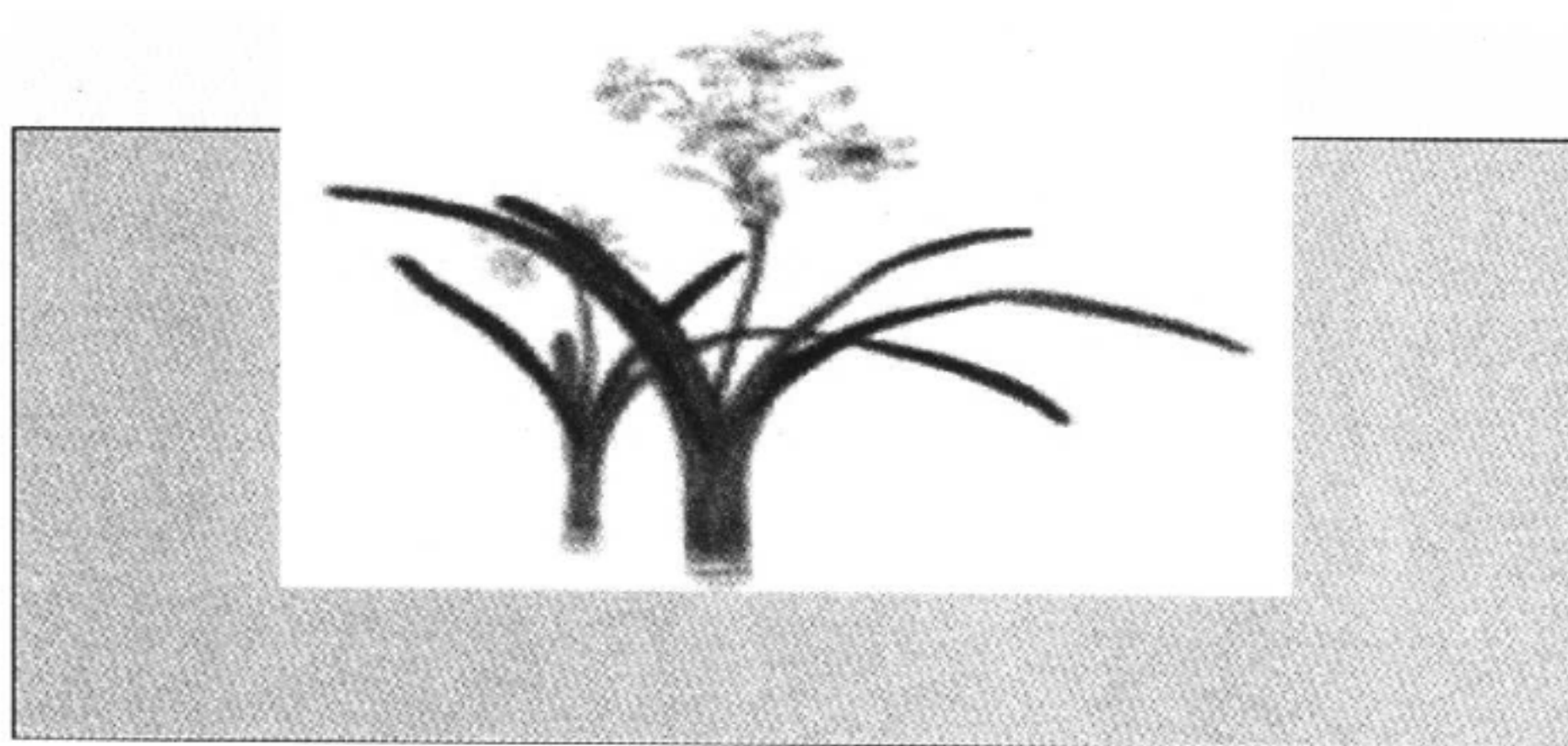


# 青少年时代





## 1.1 不平凡的家庭

穆勒于 1806 年 5 月 20 日出生于伦敦郊区，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 ~ 1836）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史上占据显著地位，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通常称其父为“老穆勒”，其子为“小穆勒”。

詹姆斯·穆勒是苏格兰人（当时苏格兰人地位微贱），在童年就因聪敏好学得到苏格兰财务署理事官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器重，随后被送入爱丁堡大学读书，费用由约翰·斯图尔特的夫人简和另外几位夫人创办的为苏格兰教会培养青年的基金会供给。他念完大学普通课程，得到传教士证书，但是从未担任过教会职务，并以能不信这个教会或别的任何教会的教义而自慰。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在苏格兰当过几个家庭的私人教师。不久，他终止执教生活，迁居伦敦，以写稿度日，除稿费外没有别的收入，直到 1819 年在东印度公司得到一个职位。穆勒在《自传》中说他父亲在这段时期里有两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件是除了在杂志上写些文章有些不稳定的稿酬外，别无其他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结了婚，还养了一大家人；另一件是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他还是计划、准备和完成了《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的写作，这项工作本来预计在 3 年内完成，但实际上花了 11 年的时间。他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来教育他的孩子，对其长子小穆勒所花

的劳力、心力和耐心之多尤甚，更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

詹姆斯·穆勒对印度史的研究，对小穆勒的童年和以后的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穆勒 11 岁时，他帮助父亲校读了《英属印度史》。在该书出版后不久的 1818 年，凭着所具有的专业学识，詹姆斯·穆勒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助理检查官，这项任命使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获得了根本的改善。他在乡下买了一座住宅可以在这里从容地研究那些令他感兴趣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也可以为他的长子选定一份自由的职业。他一度考虑让约翰·穆勒从事法律工作，但在 1823 年，由于公司有另外一个助理检查官的空缺，詹姆斯·穆勒便为自己的儿子谋得了这个职位。这样，直到约翰·穆勒在 1858 年辞职之前，他一直在为英属印度政府工作。小穆勒在少年时期的后几年中，参与了他父亲的全部写作活动。当小穆勒在 1823 年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职位时，人们把他看成是詹姆斯·穆勒的一个复制品。

## 1.2 在父亲特殊教育下成才

青  
少  
年  
时  
代

John  
Stuart  
Mill

穆勒没有进过学校，自幼在父亲特殊方式的教导下成才，被人称作是“造出来的天才”。穆勒从他父亲那里学习了他的全部课程。父亲依照自己的意见，力图使穆勒得到最高等的知识教育。

小穆勒在 3 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学希腊文，4 岁时教他历史，8 岁时教他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在 10

岁之前，他已经读完希腊文书籍《伊索寓言》、《远征记》，并通读了柏拉图的六篇对话、苏格拉底的《回忆录》，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希腊罗马时代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父亲不论教什么，都要求穆勒竭尽全力去理解，有时还要穆勒读许多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在穆勒学习希腊文功课的整个过程中，父子俩总是在同一间房子里同一张桌子上工作，以便于穆勒碰到不认识的字时向父亲讨教。父亲虽然在紧张地写作数卷《印度史》及其他文章，但还是一直耐心忍受这种不断的打扰。

在小穆勒每天接受的教育中，正式授课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学习是通过自己阅读和父亲的口头教导完成，后者多半在散步时进行。穆勒在读书时用纸片写下笔记，早晨散步时就把记下来的内容念给父亲听。在这种方式下，他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穆勒经常和父亲以散步的方式谈论读过的书本，父亲一有机会总是向穆勒解释一些概念，如文明、政治、道德和精神修养等，过后，又叫穆勒用自己的话向他重述这些概念的含义。有许多书，穆勒嫌它们乏味，不主动找来阅读，父亲就指导他读，还要向他口述这些书的内容。

当穆勒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时，一个妹妹跟他一起学，他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弟弟妹妹相继参加听他讲课，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穆勒并不高兴做这种工作，由于还要对她们的功课同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他就更加不乐意。但是，穆勒从这种训练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他都懂得更加彻底，



记得更加牢固。这说明向别人分析疑难的做法，对于这样年龄的儿童也有裨益。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穆勒第一次读到的关于道德与心理的、表达明晰的科学论文。其中，古人对人性和生活的许多精辟见解，父亲要他特别用心阅读，并嘱咐他把书中要点摘录下来写成提纲。在那几年里，穆勒完全学会了初等几何与代数，至于微分学和其他高等数学则学得不多。因为父亲早年学到的数学知识多已忘掉，又没有时间复习，所以无法解决穆勒在学习中的疑难。而历史一直是穆勒最喜欢的科目，尤其是古代史、希腊史、罗马史、古代世界史，他可以说是博览史书。通过不断的阅读，古代人的历史细节充满了他的脑海。在整个童年里，穆勒热衷于一种撰写历史的练习，以他喜爱的作品为依据编写简写本。几年后，他觉得这种充满孩子气的作品十分无聊，便把全部稿子毁掉了。当时，他还不懂得珍惜第一次写作与论证的尝试。父亲鼓励他进行这种有益的写作，但从不看他所写的东西，以免去穆勒在苛求眼光下写作时的战战兢兢的感觉。

大约从 12 岁起，穆勒开始学习他父亲十分感兴趣的逻辑学。穆勒的教育过程进入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的问题已不再是运用思想的补助手段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从系统地学习逻辑学着手，穆勒开始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the Organon)。在读《工具论》的同时，穆勒的父亲要他读几篇关于经院逻辑学家的作品，有的全读，有的读一部分，要求他在每天散步时把所读的内容详细讲给他听，并回答他提出的无数盘根问底的问题。穆勒的父亲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习惯，

即他不论教穆勒什么功课，一定要他彻底懂得，并理解其效用。在学习三段论逻辑学时尤其如此，因为三段论逻辑的有用性遭到许多权威作家的责难。穆勒能自如地运用智力，表现在对错误论点的分析上，他的这种思考能力来自父亲坚持不懈地智力训练，其中学习逻辑学养成的思维习惯是这种训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现代教育中，没有任何学科比适当运用逻辑学更能善于把握词和命题的精确含义。

这个时期除学习逻辑学外，父亲继续要求穆勒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书籍，选择的是不只在语言上、还要在思想上都值得阅读的书籍，其中包括许多演说家的文稿。几篇主要的演说辞要读好几遍，还要写出对它们全面分析的文章作为练习。穆勒父亲对这些演说辞的评论对穆勒极有启发，大部分评论超过穆勒当时的理解力，但是在他心地里播下的种子，到一定时候便会发芽生长。

当然，穆勒父亲写的《印度史》对穆勒的教育有极大帮助，从这本杰出的作品中穆勒得到许多新的观念。书中对印度的社会与文明和对英国制度与治理所作的批判和探讨，在穆勒思想中起了推动、刺激和指导的作用，使穆勒很早就熟悉这些道理，对其后来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大约在《印度史》出版一年之后的1819年春季，穆勒的父亲得到东印度公司检查官的职位，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对穆勒的教育。就在1819年，13岁的穆勒开始接触到了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并且学完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课程。虽然李嘉图的这

部杰作已经出版，但适合向初学者具体介绍其理论的指导性的文章尚未问世，所以，父亲开始教这门科学时，采取这样一种讲授的办法：在散步中进行教授。他每天详尽地讲解一部分，第二天穆勒交给他父亲笔录的讲稿，穆勒要一遍一遍重新改写直到文稿清楚完整地表达出来。于是，一部介绍性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入门》就完成了，穆勒的作品最诱人的地方在于能够以明白畅达的方式表达出那些晦涩抽象的观念。该书于1820年出版。

穆勒在14岁前已经结束了高等教育，这应归功于其父亲的早期教育。这种教育已经证明，人在幼年时期能接受并且能很好接受的东西比一般设想的要多得多。当然，如果约翰·穆勒不具有超人的天赋，这样一种教育也是不可能的。或许正是这个孩子在自己把握那些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敏捷和潜力，才激励他的父亲给他灌输更多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这种方法的严格性的确带来了真正的益处。穆勒从不在琐碎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从不在那些巨大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前望而却步，而是全力以赴地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耐心地和系统地求索出它们的含义。穆勒很早就知道，把握一个主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写出自己关于它的“系统论述”。穆勒在20岁之前，就已经为报纸和期刊撰写了大量成熟老练的文章，就已经成为他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

大部分经过训练而具有许多学识的儿童或少年，他们的精神不但没有因为有学识而加强，反而受它的连累。他们的脑子里充塞着单纯的事实和他人的意见言



辞，并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代替自己的独立思想。但是，穆勒接受的不是填充式的教育，老穆勒决不允许儿子的学习仅仅是记忆的练习。他一定要儿子透彻理解每一阶段所受的教导，而且尽可能在施教前要孩子先去领悟其内容。凡是能运用自己思考得出的东西父亲从不讲解，只有尽了努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才给予指点。这种训练使得穆勒一开始就能独立思考问题。

少年成才者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就是自满，这往往能毁灭一个青年的前程。穆勒的父亲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以高度的警惕性不使穆勒听到赞美的话，不让穆勒和别人做自我夸耀的比较。在他自己和儿子的接触中，只发表对其不满意的意见，他定的比较标准，不是和别人所做到的相比，而是和一个人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相比。父亲不让儿子接受那种使他十分担心的影响，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成功的。穆勒根本不知道，他所得到的知识以他的年龄而论是颇不寻常的。有时偶然注意到有些孩子懂得比他少，他会认为并不是自己知道得多，而是别人由于某些原因知道得少，或者认为他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一样。他的心情既不自卑也不骄傲，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怎么样或者能够怎么样。他对自己根本没有作过评估。他认为自己在学业上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和父亲的期望相比较，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够的。每当穆勒和大人们一起讨论那些不是他这种年龄应该谈的事情时，听到不同的意见，便毫无顾虑地直接进行反驳，这个时候别人会认为他自满过分，但事实上，穆勒确实没有任何优越感。穆勒对父亲十分敬畏，在杰出的父亲面前更没有丝毫的傲慢。

在14岁那年，穆勒要去法国旅行，临行前，父亲告诉他，“等你结交新朋友时，将会发觉你所接受的教育不是与你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普遍懂得的，许多人很可能会因此赞扬你。你比别人懂得多一点，不是你有了了不起的地方，只是你的命运赋予你不寻常的优越条件：有一位能教育你的父亲，愿意承受必要的麻烦和耗费必要的时间。如果说你比不具备同样优越条件的那些人懂得多些，你是不该受称赞的，假如你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那就是最大的羞耻了”。对父亲的话，穆勒深信不疑。别人没有自己懂得多，并不值得以此为荣，也从不把自己的不论哪种知识当作自己的优点而沾沾自喜。每当他想到这个问题，总是觉得父亲说的关于自己具有特殊优越条件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这种认识成为他不变的看法。

的确，很少有人能像穆勒那样经受住成名的考验。他能避开成名后可能遇到的陷阱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敬畏心和同情心。穆勒在其《自传》中描述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若是性格不那么坚强的人，这种教育也许会窒息这两种感情，但就穆勒来说，反而使这两种感情更加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情心使他不洋洋自得，敬畏心使他不为任何人的吹捧所动，不把任何人的评判当作最后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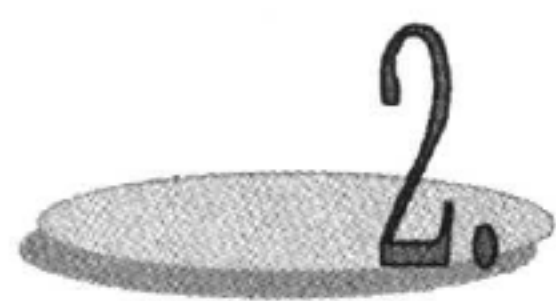
穆勒在其生命的暮年有这样的评论，他说他所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来自他的父亲。当然，这位“历史上的大师”这样谦逊地坦言自己所受的恩惠，并不会使他的独创性在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中相形见绌。

然而，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事实是，约翰·穆勒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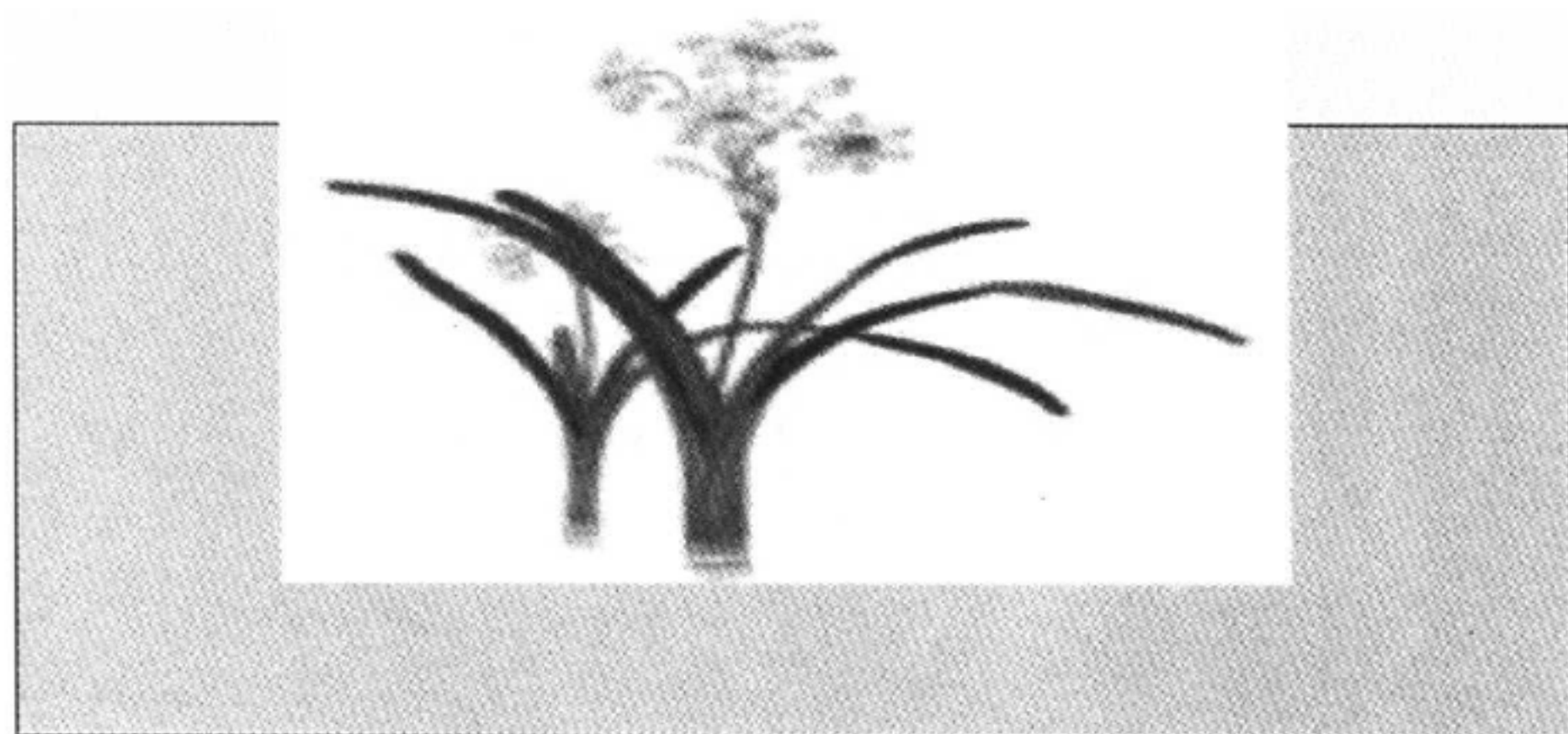
育的过程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经历，他过的是一种压抑的生活——没有普通学童的集体生活，没有同伴，也没有假期。由于詹姆斯·穆勒的孤傲，他决心亲自教育他的儿子，而对他的童趣无暇顾及。穆勒几乎没有儿童玩具，几乎没有消遣性书籍，也没有什么室内游戏，儿童读物也很少，穆勒儿童时代最喜爱的《鲁滨逊漂流记》属于亲友偶尔馈赠，《一千零一夜》、《唐吉珂德》等名著是父亲特地借来的几册，父亲虽然不喜欢让穆勒多读这类书，但也不禁止阅读，甚至鼓励他阅读和写作一些诗歌，但是穆勒阅读这些较为轻松的东西，不可能仅仅为了愉悦而无忧无虑地沉浸在富于想象的作品之中，一切都必须服从于詹姆斯·穆勒所制定的学习计划。这种教育方式是十分严格的甚至于有些苛刻。试想，父亲和儿子共处一室，在各自的桌子上工作，穆勒与他的问题苦斗，当他打断父亲的工作寻求帮助时，必须鼓足全部的勇气。在一天结束时，他们通常到外面散步，穆勒也得不到放松，这时父亲会要求他的儿子对读过的东西进行解释并说说他究竟懂得了多少。然后，他必须对这些知识加以实际的运用。在弟弟和妹妹稍大之后，还必须为他们讲课。如果他们学得不好，他就会和他们一道受罚。还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把他当作一个秘书来对待。这样一种超常训练使穆勒成为一个制造出来的天才，也带来了消极的问题。穆勒的母亲和蔼可亲，但她对丈夫的严厉态度听之任之并没有用母爱和温情来抵消它。穆勒在多年后回顾这段童年时光时，实在想不起自己的母亲究竟有哪些事情值得一提，他能够回忆起来的无非是父亲强加给他的那些艰涩的图书和难以理解的问

题。因此，穆勒一度陷入的精神危机令世人怀疑其父亲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注重理性分析、批判，忽视直觉与情感。





## 成就、苦闷和觉醒





## 2.1 立志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

1821年，当穆勒在法国逗留了一年回到英国后，他首次接触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 ~ 1832）的著作。他的父亲把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法文译本送给他阅读。他第一次接触到“功利原则”，这使他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制高点，由此可以俯瞰一个广大的精神领域，这时穆勒才15岁。

边沁认为，人们为自己追求的惟一内容就是趋乐避苦。因此，人是自我主义者。他们渴望的幸福无非是能够压倒一切痛苦的快乐。一个行为，只有当它导致或行将导致快乐而非痛苦时，它才是善的。最有德行的是那些能够以最精确的方式对此进行计算的人：道德活动实际上就是运用快乐和痛苦的单位对一个活动的后果进行计算。当然，人们因其境况的不同对快乐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不能预见到一个既定行为的全部结果。因此，这里需要一个立法者。边沁把自利视为一种普遍的目的并据此来协调人们在社会中的关系：人们在自利的同时也要有利于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立法者可以假设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将会根据功利原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他的任务是将这种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并表明它可以“为绝大多数的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幸福”。那么，共同体中的多数人如何能够在立法者的指导下，致力于求得整个共同体的幸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边沁花费毕生心血寻求“立法理

成就、苦闷和觉醒

John  
Stuart  
Mill

论”。

穆勒很快就与那些崇拜其父亲和边沁的青年组成“功利主义学会”，不久又成立了“思辩学会”，对参加这个狂热的小团体，穆勒感觉特别良好。他在其《自传》中概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对代议制政府和自由讨论的信念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之所以鼓吹民主政体并不是出于一种关于自然权利的信念，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确立一个好政府的惟一可靠方式。贵族政治是他们的死敌，由于它更具有渗透力，并且得到了英格兰教会和法律的支持，他们认为它比专制政体更加可憎。只有将公众动员起来反对这两种势力才能把它们摧毁，而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公开的辩论来戳穿它们的伪装。穆勒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财产所有权是天经地义的。这些人中没有贫困者，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阅读了大量深奥的功利主义著作。但是，没有人像约翰·穆勒那样在公共事业上倾注了那样大的精力。

自从1821年冬天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尤其是从边沁创建《威斯敏斯特评论》开始，穆勒对生活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他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穆勒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所写的文章已经成熟，具有融会贯通的特色。穆勒对辩论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在公开辩论会上所做的公开演讲在这几年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所希望得到的个人同情也就是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者的同情。他竭力享受生活道路上所能得到的同情，但是他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永久满足的源泉，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庆幸自己确实无疑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把幸



福放在长期和遥远的事物上，在追求这种事物上总是时时有进步，而这种事物又决不会完全得到，因而他的幸福感也不会消失。这种想法在这几年中鼓励着他，想到在这几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般性改良，以及他和他人为了改良世界所进行的斗争，穆勒便感觉现实生活似乎充满了乐趣和生气。

此外，穆勒还以前所未有的劲头继续学业，同时也在报纸上写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是在《旅行者》晚报上的两封信。《旅行者》当时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托伦斯上校的产业。该报许多的政治经济学文章由托伦斯先生亲自执笔，当时他正在批判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的某些理论。在父亲的鼓励下，穆勒写了一封信进行回答。当时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宗教上没有言论自由，甚至在理论上的探讨都不许可，持异议的人不得不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随时准备反复辩论。穆勒连续写了5封信详细论述自由发表宗教见解的重要性。在1823年全年中，穆勒有相当多稿件发表在《旅行者》上，有的是书评，但更多的是评论议会发表的一些胡言乱语、法律的缺陷，以及关于地方行政官或法院的失职行为的通信。

这时的穆勒正处于青春勃发锋芒初露的时期，他对自幼承袭的信念笃信不疑。他的文字和言谈中散发着一个早熟青年的独断气息。这时的穆勒已经是出类拔萃的理论家和功利主义学说的代表者。

## 2.2 一次异乎寻常的精神危机

1826 年秋天，穆勒 20 岁的时候，他忽然对辩论丧失了全部的热情。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治疗自己，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他最喜欢的作品变得索然无味，音乐也是如此。虽然他强迫自己承担起应尽的责任甚至仍坚持写作，却提不起兴趣。他觉得自己丧失了全部的感受能力，过去那种分析性的教育似乎剥夺了他的全部情感。这些念头持续困扰着他，他犹如刚从梦中醒来，处于神经麻木状态。他在内心觉得，往日快乐的事情现在变为枯燥乏味或与自己漠不相关。一天，他问自己：如果有一天他自幼坚信不移的理想全部变成了现实，“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sup>①</sup> 他惊恐地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至此，穆勒的心在下沉，他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了。他的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突然变得一片空虚。他向昔日爱读的书寻求安慰，那些记载历史上高贵和伟大人物的史书，过去他一直从那里吸取力量和生气，现在却解决不了他的苦闷。现在读这些书毫无感觉，或者虽有习惯性的感觉，但引不起兴趣。他认为，

成就、  
苦闷和觉醒

John  
Stuart  
Mill

<sup>①</sup> 《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83 页。

他对人类的爱和为美德而对美德的爱，业已消磨殆尽。他还感觉到，他的悲哀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或值得尊敬的感情，丝毫不值得别人同情。他也没有一丝希望向别人取得帮助。面对任何具体的困难，父亲自然是他求助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穆勒决不愿求他帮助。他绝对相信，父亲不能理解自己所遭受的这种精神危机，即使能够使他理解的话，他也不是使自己摆脱痛苦的医生。

穆勒在学习过程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所有精神的和道德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对外界联想的结果。我们爱一种事物，恨一种事物，我们对一种行为和意图感到喜悦，对另一种感到痛苦，是由于我们对那些事物有喜悦或痛苦的观念，是出于教育或经历的效果。因此，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建立最牢固的、可能的、有益事物的联想，把喜悦与所有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把痛苦与所有有害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这个道理似乎是颠扑不破的。但是，穆勒现在回想起来，才感觉到他的老师们在建立和保持此种有益联想的方法上是很肤浅的。他们完全信任陈旧的大家知道的方法——赞美和责备，奖励和惩罚。穆勒毫不怀疑，及早和不间断地使用这些方法，可能建立起剧烈的痛苦联想和喜悦联想。但是，单凭这些希望与喜悦完全不足以使生活圆满。知道有一种如果有了它就会幸福的感情，并不等于就能等到这种感情。穆勒所受的教育不足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而他在培养知识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过早发展和过早成熟的分析能力，已成为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习惯。

穆勒想，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

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对于我曾经努力争取的目标，现在已没有真正欲望。对于德行，对于普遍的善行，我没有兴趣，对其他事物也很淡漠。穆勒在少年时代已经有过某些虚荣的满足，在出人头地的希望尚未变为激情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荣誉，他觉得自己得到的名誉地位尽管这样细微，但是它们还是来得太早了。像所有来得太快的喜悦一样，它使穆勒对于名誉地位的追求感到厌倦和淡漠。不管是自私的喜悦还是非自私的喜悦，对他均不成为喜悦。似乎世界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使他那颗陷于绝境的心灵与人类想望的任何事物建立起新的喜悦的联想。这些人性规律，使他陷入精神上的危机状态。

## 2.3 在对功利原则的异议中觉醒

这种思想状况与 1826 年阴沉冬天的枯燥沉闷气氛相交织。在这段时间里，穆勒能例行公事，却是机械地只凭习惯的驱使去做。因为他受过某种精神活动的训练，即使心不在焉仍能照常工作，甚至还草拟讲稿在辩论会上发表几次演说，至于讲得怎样，有几分成功那就知道了。他在功利主义学会连续演讲了四年，但这一年的情形他几乎全部忘掉。他的头脑里，有两句诗是他感觉的真实写照：

没有希望的工作，犹如汲酒于筛，  
没有目的的希望，无法存在。

他自问：如果我的生活一定要这样下去，我能不能



或者我有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他总是这样回答自己：我认为我不可能忍受一年以上。但是半年时间刚过去，一线微光透过穆勒沮丧的心扉。有一天，他偶然阅读一本法文传记马蒙特尔的《回忆录》，读到作者父亲去世那一节，讲到一家人忧伤的处境，作者（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突然有一种激情意识到，并使家里人都觉得，他将是一家人惟一的依靠，他将填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书中描述的生动的场景和挚情深深地感动了穆勒，他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这使他如释重负，从这一刹那起他的思想负担有所减轻。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没有死灭。从这一刻起，他的压抑感开始得到缓解。那种自以为所有感情已经死去的思想上的压迫感消失了。他不再绝望，不再是一块木头或石头。时刻缠绕在心头的无法治愈的沮丧情绪去掉了，逐渐发觉寻常的生活小事又能给他一些愉快，又能从阳光和蓝天，从书本、谈话和公务中享受到并不剧烈但又充分的欢乐，穆勒在他的见解为公众利益发挥的力量中再次感到激动。就这样，阴霾逐渐消散，他重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虽然还有几次旧病复发，有几次还持续好几个月，但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不幸。这表明，穆勒所具有的某种东西，还是会产生全部有价值的品性和全部取得幸福的能力。

穆勒在《自传》中对这个“精神危机”的描写格外醒目，它比后面对其妻子的追述更加深刻和直接。在1826年危机中，他的一个发现就是分析性的教育是十分片面的，也就是说，分析力量的发展是以泯灭各种感受为代价的。当他重新发现自己的感受能力时，这个危机便告结束。

穆勒从音乐和诗歌里寻找他所需的“情感文化”，寻求艺术培育人的道理，但是过了好久才从亲身经验中懂得这个道理。

音乐最大的效果在于激发热情，提高人的想象力，提高人们个性中原已存在的高尚情操。音乐的刺激使这种感情发光发热，虽然这种激情达到最高程度是暂时的，但是保持这种情操是极为宝贵的。穆勒经常感受音乐的此种影响，除了在思想沮丧时期愉快的感受暂时消失外，他一直想从音乐中找寻慰藉，到阴霾过去，疙瘩解开，处在恢复阶段时，美妙的曲调给穆勒极大快乐，这种快乐的源泉还是和以往一般使他感动。穆勒肯定人类的总的命运与他个人的命运是分不开的，问题在于：倘若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者能实现其目标，社会上每个人得到自由和物质上的舒适，生活的快乐会不会因为不再存在贫困不再需要斗争，就将不再成为快乐。

在思想最痛苦的时期，穆勒读完拜伦（Byron）的全部诗歌。一般人认为诗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有较强的感情，穆勒想让诗人唤起内心的感情，但效果适得其反。这位诗人的心境和穆勒太相似了，他的诗正是一个已厌倦一切喜悦的人的悲哀，在他看来，生活对于所有生活条件很好的人必然是枯燥乏味毫无兴趣的，这与穆勒当时的看法毫无二致。虽然拜伦的诗完全不适合穆勒的心绪，可是另一位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恰好适合。首先，这些诗有力地触动了穆勒最强烈感到快乐的敏感之处，即对乡村风物与自然景色的爱好，这些诗不但是穆勒生活中大部分快乐所在，而且把他从最近一次时间最长的沮丧复发中解脱出来。乡村美

景为他从华兹华斯的诗歌里吸取欢悦打下基础，是什么使华兹华斯的诗像一味医治穆勒心病的良药呢？就是他的诗给人不仅是外表的美，而且在动人的美景下含蓄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它们似乎是感情培养剂，穆勒仿佛从它们那里得到喜悦的源泉，得到同情的和想象中快乐的源泉，这种源泉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和人生的斗争与缺陷无关。人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越是改善，这个源泉就越丰富。从那些诗篇里穆勒懂得，当生活中所有较大的邪恶去掉时，什么是快乐的绵绵不断的源泉。在他接受这些诗篇的影响时，顿觉精神振奋，心情愉快。在那个时代里，肯定有比华兹华斯更伟大的诗人，但是具有更真挚更崇高感情的诗歌却不能像他的诗那样给穆勒力量。只有华兹华斯的诗帮助穆勒在安静的沉思中享有真正的永久的快乐，使他不但不脱离人的共同感情和共同目标，而且对它们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些诗章给穆勒的喜悦足以证明，有了此种教养，即使养成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也不可怕。穆勒逐渐地完全从长期的消沉中挣扎出来，从此再不受其折磨。

穆勒承认在他的教育过程中存在着某些缺陷，但从总体上说，他最终相信自己从这种教育中学会了自己思考，而他一度认为应由这种教育负责的1826年危机最终成为了上述思想的证明，而他最终能从精神危机中得到解脱已经表明分析能力并非完全是破坏性的。

1829年，由于穆勒的信念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受到了攻击，他退出了辩论学会。他并不是由于屈服于他的批评者才退出的，而是因为他现在觉得辩论并不能推

成就、苦闷和觉醒



进真理。此后，他不止一次地否认自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需要一些时间来对自己承袭的东西进行反省和重新审视。

精神危机的这段经历给穆勒的思想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意味着对自幼承袭的信念的决裂，有人说这意味着某种真正的觉醒。现在他觉得和父亲之间的思想状况产生了很大距离。事实上存在的距离确实要比双方冷静思考的还要大。幸运的是，在有关当前的政治问题上他们几乎总是持完全一致的意见，而政治问题又是父亲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他谈话的主要题材。至于意见不合的那些分歧，父亲的理解是，自己的教育方法培养成儿子独立思考的习惯，因此会接受与他不同的思想。

精神危机的这一段经历在穆勒的思想和性格上产生明显的后果。

首先，它使穆勒持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信念。穆勒确实未曾动摇过固有的信念，即快乐是所有行为规则的检验标准和生活的目的。但是现在他认为，这个目的只有在不把它看作直接目的时才能达到，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在做其他工作而有同样目标的人，他们也能在工作中得到快乐。他现在的信念是：生活中的各种享受足以使生活成为乐事，但是必须不把享受当作主要目的，而把它们看作附带得到的东西。若是一旦把它们当作主要目的，就会立刻觉得它们不足以成为乐事。它们禁不起仔细考查。如果你细细盘问自己



快乐不快乐，你就会觉得不再快乐。惟一的办法是不把快乐当作生活目标，而把快乐以外的目的作为生活的目标。另一种情况，如果你处在幸福之中，那么你就不要详论和细想快乐，不要在想象中独占快乐，不要追根究底而使快乐跑掉，这样在你面前随时随地都有快乐。这个信念现在成为穆勒处世哲学的基础。他认为它也是所有对享受只赋有中等程度敏感和能力的人，也就是世上极大多数人最好的信念。

在这个时期，穆勒思想上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之一。他不再把外部条件的安排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训练看作惟一的重要因素。他的经验告诉他，与对主动的能力一样，被动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也需要熏陶、滋养和指导。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或低估以前发觉的那一部分真理，他依然承认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决不否定分析的力量与作用是改进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他想：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程度上必须加以纠正，除它之外还要结合其他种类的教育。要在各种能力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是穆勒现在认为的头等重要事情。感情的培养成为他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

精神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穆勒意识到边沁赖以确立自我主义功利原则的理由是相当不充分的，摒弃边沁的自我主义快乐论并不会给功利主义的整个体系带来更大的破坏。穆勒针对边沁指出，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通过联想而成为渴望或憎恶的对象，在宣称所有人都受其利益的支配时，边沁所说的不过是所有的人所做的无非是他们觉得应该去做的事，在这里，利益一词的使用

正如自私性和低级的自我追求的说法一样只是鼓励了一种粗俗的语言使用习惯。一个生硬的动机观念引出的只是一个同样生硬的善的观念。边沁毫不关心我们赖以获得伦理准则的方式，这表明良心和义务在他的体系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行为者本人的性格可能会影响到对一个行为之后果的计算。5年以后，穆勒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边沁的伦理学只能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商业方面。他把世界理解为那些追逐着一己私利和快乐的个人的总和，而要阻止他们在竞争中相互冲突，就只有诉诸他们对法律、宗教和社会舆论的恐惧或期望。自我教育、个人爱心的培养和良好的愿望在边沁的体系中只是一片空白，换句话说，穆勒摒弃了边沁根据开明的自利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理性社会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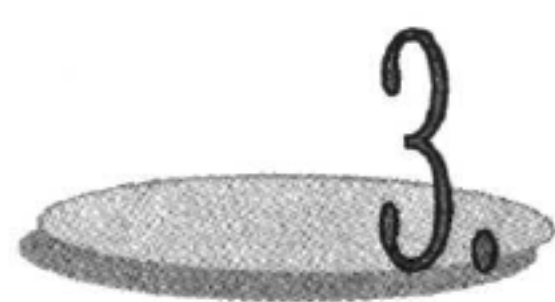
要清算边沁对功利主义所作的一种生硬和扭曲的解释并不是一件难事，而要证明功利主义这种信念与较高的道德观念和人类文化是一致的就不那么容易了。穆勒希望证明，边沁关于幸福计算的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他的父亲在《英属印度史》中把功利原则当成衡量不同民族从野蛮向文明进步的尺度，这或许可以辩护他们在代表着落后的次大陆利益的印度议会中所作的各种努力，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英国人会拒绝把功利性当作行为的准则。实际上，穆勒孜孜以求的是对功利主义进行这样一种解释：它能够把伦理学的推敲完善与对某一行为所具有的道德性的客观检验结合起来。

穆勒最终在关于高级和低级快乐的学说中找到了这种解释。在《功利主义》一书中，他指出，那些致力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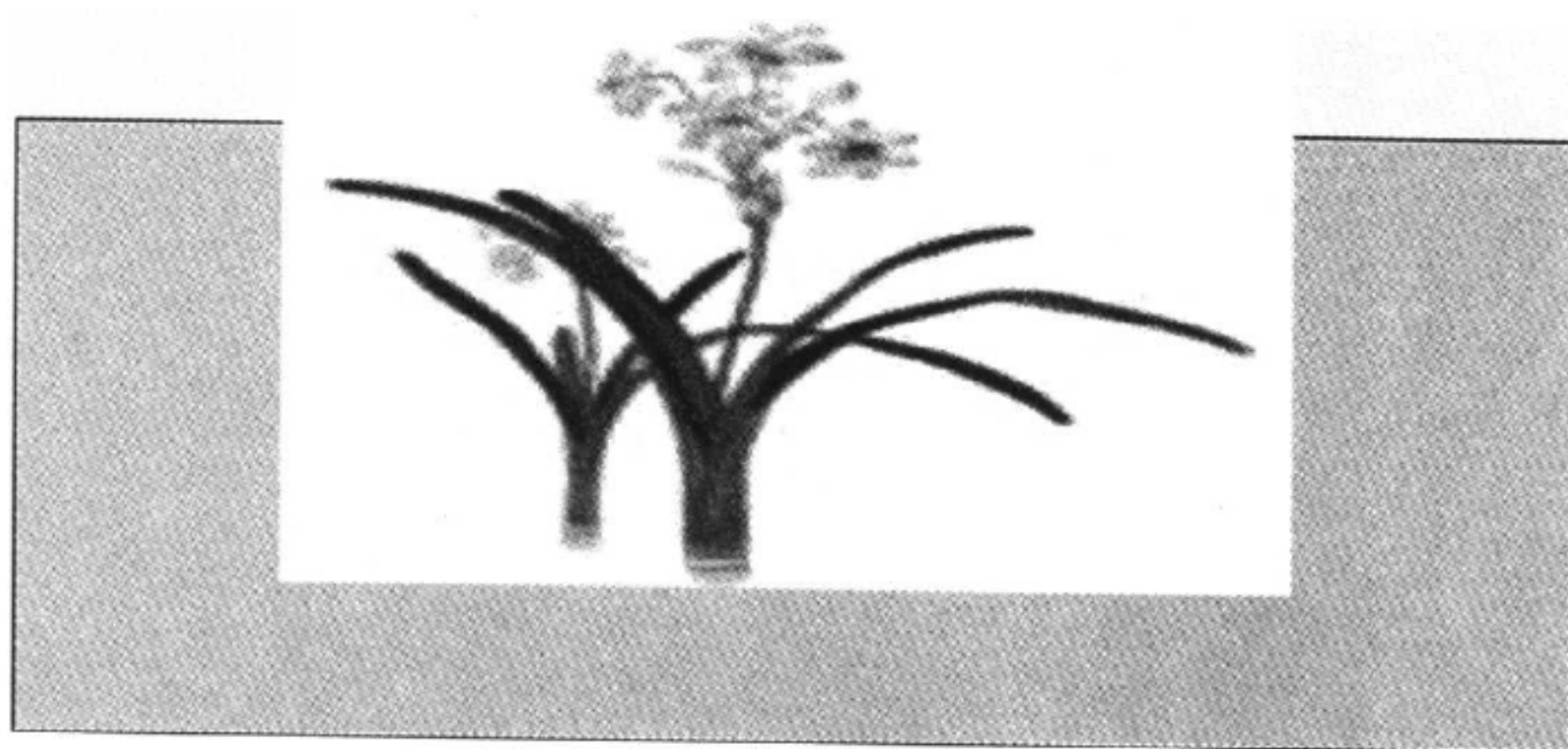
追求人类之善的理想主义者仍是在追求快乐，不过这是一种高级的快乐。当一个教养良好的人需要对一种经过升华的快乐如读诗和一种粗俗的快乐如饮酒做出选择时，他通常会选择前者。所以，他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宁作痛苦的苏格拉底，也不作心满意足的蠢人。这句话代表着穆勒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区别，不过这是后来形成的思想，他在 19 世纪 30 年代更关心的是边沁文化遗产中的另一部分内容，即功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穆勒对边沁功利原则的异议使其从精神危机中觉醒。







与泰勒夫人





### 3.1 漫长的友情

在穆勒的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他曾想：倘若世上有一个人，我爱他程度之深，达到非把我的悲哀向他倾诉不可的程度，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处于这种境地。

1830年，在穆勒精神危机的阴云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期，他认识了一位女士，并得到了这位女士的友谊，这时他25岁，她23岁。他们经历了20年的交友，最终结为夫妻，这成为穆勒一生的荣耀和主要的幸福来源。这位女士就是泰勒夫人。

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丰富而又深沉的妇女，具有坚强的性格，有洞察力和直觉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穆勒常就精神气质方面把当时的她比作诗人雪莱，认为不论在最高的思辨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她的智力是洞察事物、把握根本观念或原则的完善工具。她动作准确敏捷，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她的感觉和思维能力上，加上感情和想象力的天赋，她适于成为一位尽善尽美的艺术家；而她热烈而温柔的心灵和雄健的辩才，又可以使她成为伟大的演说家；她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世事的洞察识别能力，如果在妇女参政时代，将能使她跻身于人类的杰出统治者之中。她无利己心，这不是出自后天培养的责任感，而是出自把他人感情与自己感情完全合一的心胸；她有无限的慷慨和爱，并随时准备把它们给予任何人而

与  
泰  
勒  
夫  
人

不希望任何感情上的报答；她有最纯真的谦逊心，同时又有最高尚的骄傲，她把绝对的纯洁与忠诚给予适于接受的人；她蔑视卑鄙懦怯的行为，对残暴、专横、不忠或不信的行为和品性表示最强烈的愤慨。

穆勒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很少，愿与之深交的人更少。在穆勒的友人中，最重要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位无与伦比的朋友。在那段时期，她大部分时间与一个女儿同住在乡间僻静的地方，偶而到城里与她的第一位丈夫泰勒先生住在一起。穆勒有时到乡间，有时到城里去拜访她。穆勒非常欣赏她那种不顾种种误解的坚强的性格，他们保持着诚挚密切的友谊。

## 3.2 思想伴侣

能与一个具有这些优良品性的人作精神上的交流，对穆勒的思想发展无疑具有非常有益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逐步增强的，许多年后，她和他的心灵达到完全契合的程度。

1849年7月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她强烈爱慕的丈夫英年早逝。她的丈夫是一位极为正直、勇敢和令人尊敬的男子，具有开明的思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丈夫终生怀着真正的尊敬。穆勒却从这个不幸中得到最大的幸福。1851年4月穆勒与泰勒夫人结婚，彼此成了整个生活的伴侣，他们在一起享受了7年半的幸福生活。

穆勒夫妇在思想方面是互相欣赏和互相补充的。那些对人类目前生活状况感到不满和执意进行激烈改革的



人，其思想可分为两个主要领域：一个是最后目标领域，它的构成要素是人生可实现的最高理想；另一个是直接有用和实际可得的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穆勒从妻子的教导中得到的比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总和还多。穆勒自己的能力却完全处于不确定的中间领域里，那就是处在理论或者说处在伦理和政治科学里。关于这两种学科的结论，不论是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穆勒都深深感谢他的妻子，因为他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不会阻止他认真地运用思考能力去探索可能取得的结论，却会保障他在思辨性质没有证实时不以一定信心确认或宣布这些结论；同时还使他的内心不但准备随时接受而且急于欢迎和热切寻找更清楚的概念和更完善的证据，哪怕是在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上。穆勒认为，妻子对其见解所产生的影响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得多，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自己妻子的心灵世界那样敬畏。

他说，人们认为我的著作比大多数同样善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对预测遥远的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因此，当两人的思想完全交融与契合时，当两人探索有关知识或道德意义的所有问题到一定深度时，当两人从同一原则出发，运用共同的方法得出共同的结论时，要分清是谁的创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执笔最少的人也许是构思最多的人，两人共同写成的作品，根本

不可能区分各自的范围，更不可能肯定这部分属于这个人，那部分属于那个人。穆勒肯定地说，“自从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友谊，可以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这种贡献是与年俱进的。除了她的思想对我产生一般性影响外，这些共同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和特色、最有效果和为作品带来重大成功和声誉的作品，均出之于她的首创，发源于她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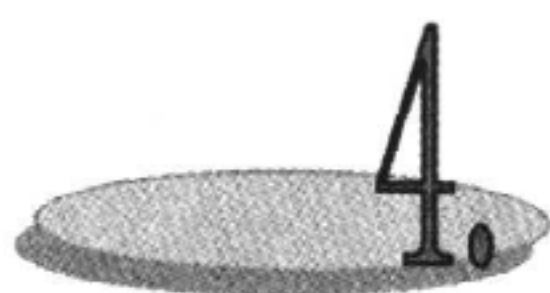
在穆勒思想进步的阶段里，他和泰勒夫人的思想是并肩前进的，他们最后改良的理想，远远超过民主主义，因之可以肯定地说是一般所称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以最大精力谴责社会对个人的专制；另一方面，还盼望有朝一日社会中不再分为游手好闲的人和勤奋劳动的人。那时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穷人，而且公平地适用于所有的人；那时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再像当时那样很大程度上根据出生门第，而是根据一致公认的公平原则；那时人类将竭力取得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而是与他们所属的社会分享的利益，这将不再是或被认为是 impossible 的事情。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问题将是如何使下列三者统一起来：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地球上原料共有，人人均享受共同劳动所得的成果。虽然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预见到某种形式的制度能最有效地达到这些目的，或者要过多久一段时间这些目的才可实现，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要使这种社会变革成为可能，或成为大家想望的事情，必须要使构成劳动群众的未受教育者和他们的极大多数雇主发生程度相等的变化。这两个阶级都要从实践中学会宽宏大量，或者无论如何为公共的社会目标，而不是像迄今为

止那样专为狭隘的利己目标劳动和联合。他们相信，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一直存在于人类之中，不会消失，将来也永远不可能消失。教育、习惯和情操的培养，将使一个普通人提升。确实，要使一般人达到这种程度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逐步实行一套培养的方法，并且继续好几个世代。目前公众利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非常淡薄，情况之所以如此，阻力决不在人性的基本结构，也并非因为注定如此不能变更，而是因为人们心里不习惯考虑公众利益，朝思暮想的只是关于个人利益的事情。现在，这样的利己心成为社会现状普遍特点的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其所以如此根深蒂固，完全是目前的制度促成的。他们以最大的快乐与兴趣欢迎所有杰出人士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这种实验不论成功失败，对参加的人都是最有用的一种教育，它能培养他们直接为一般福利而工作的能力，或者让他们知道是什么缺陷使他们和其他人不能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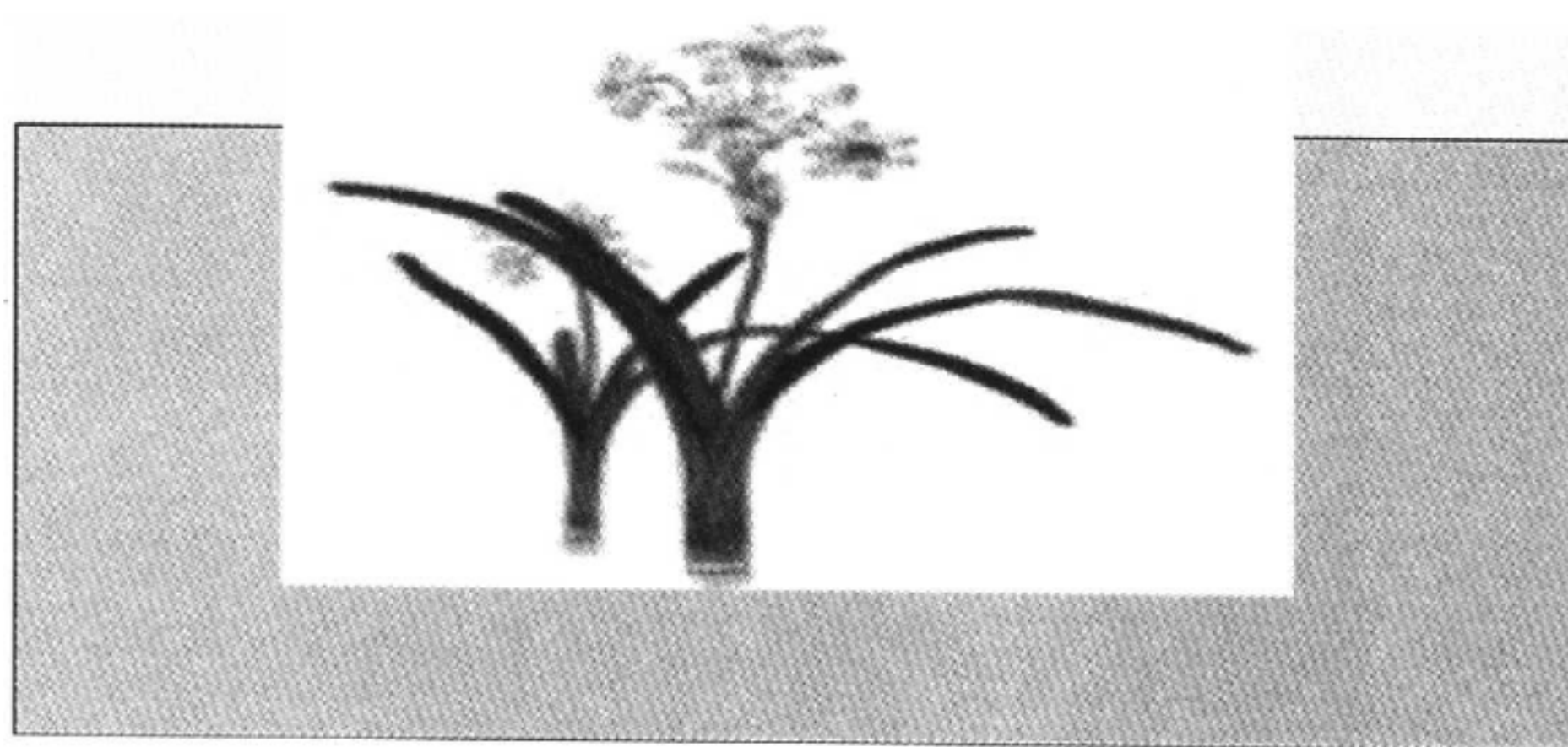
与  
泰  
勒  
夫  
人







# 19 世纪英国 归纳主义的代表





## 4.1 创建求因果四法说

穆勒在逻辑方面是 19 世纪英国归纳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逻辑是研究人类知性在追求真理活动时的科学。他把逻辑推理从广义上分为归纳和演绎，并认为前者是由一些命题推出一个一般性较大的命题；后者是由一些命题推出一般性较小或者相等的命题。他把归纳定义为发现和证明一般性命题的活动。他在培根三表法和排斥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归纳法，即契合法、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被称作是实验研究四法。他还考察了将前两种方法结合应用的方法，并称之为契合差异并用法，或求同求异并用法。这些方法探究现象间的因果联系，故又称作求因果方法。

1843 年穆勒的《逻辑学体系》一书获得成功，在《逻辑体系》第 3 卷“论归纳”的第 8 章“论实验研究四法”中，表述了求因果的 5 条规则：第一，如果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例只有一个情况是共同的，那么这个惟一的使所有事例有一致之处的情况，就是给定现象的原因或结果。第二，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出现于其中的一个事例和它不出现于其中的事例只有一个情况并非共同，而这个情况只出现于前者中，此外的每个情况是共同的，那么这个惟一的使两个事例有差异的情况，就是该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原因的一个必要部分。第三，如果现象出现于其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例只有一个情况是共同的，而现象不出现于其中的两个

19 世纪英国归纳主义的代表

或两个以上的事例，除没有那个情况外，并无任何共同之处，那么这个惟一的使两组事例有差异的情况，就是该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原因的一个必要部分。第四，从任何现象减去那种由于以前的归纳而得知为某些先行条件的结果的部分，于是，现象的剩余部分就是其余先行条件的结果。第五，凡是每当另一现象以某种特殊方式发生变化时，以任一方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就是另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或者是由于某种因果事实而与之有联系。这5条规则所概括的方法依次被称为契合法或求同法、差异法或求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或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及共变法。穆勒尽管表述了5条规则，但他始终只提“四法”，而把契合差异并用法置于其外。不过，“五法”和“四法”所指的内容是相同的。

穆勒求因果四法是对弗兰西斯科·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 1626）提出的“三表法”的发展，也是对归纳方法的强化。培根在《新工具论》第2卷第11至13节所叙述的“本质或具有表”、“差异表”、“程度表”，依次与穆勒的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相应，第18节所叙述的“排除法一例”则与剩余法相应。但是，培根“三表”的作用在于提供事例，“其真正的归纳”的基础在排除过程中，直到得出肯定结论时才完成，而穆勒的各个方法则被认为都是可以独立得出结论的。

穆勒认为，归纳是“经验的概括”，是一种由已知到未知的推论过程，人们借以得出结论说，对于一类的某些个体为真者对于全类亦真，或某些时间为真者在相似情况下随时为真。凡不包含推论作用，而且结论范围不超过前提者不应称为归纳。在他看来，人们一开始不



得不用简单枚举法，而且在没有较锐利的探索手段的情况下往往必须依靠它，但它毕竟是粗疏的，为了精确地研究自然，人们需要有一种较可靠而有力的工具。他断言，与演绎法有区别的、经验的、后天的、直接归纳的实验研究，只有他所说的四种可能方法。除此之外，至少他不知道或不能设想还有任何其他方法。经验的概括有确实的和仅仅或然的之分，但是这种命题本身总具有“所有 A 是 B”的形式。至于承认并非全称的“多数 A 是 B”式的命题，虽非常重要，但不是普遍真理而是普遍真理的近似概括。穆勒的归纳方法的结论应当是确实而普遍的，他认为归纳逻辑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有确实而普遍的归纳。

《逻辑体系》的写作开始于 19 世纪 20 年代末，即穆勒的“实践折衷主义”时期。该书完成的时候，穆勒对给予他深刻影响的经验主义越来越充满信心。然而他却一方面遭到了墨守陈规者的反对，另一方面遭到孔德和实证主义者的反对。其实，他原希望这会是一本消解纷争的书。既然人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源于方法的不同，那么他认为一本论述科学方法的书将有助于使当代最先进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统一认识。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抱着这一希望说逻辑是一个共同拥有的基础，但随着这本书的进展，穆勒遇到了来自他所继承的哲学传统的批评，这些批评使他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洛克以及他的父亲。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惠威尔 (Whewell, 1794 ~ 1866)，提供了大量的对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直接描述，这正是穆勒所急需的，但是穆勒最终还是把惠威尔当作对立的直觉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

19 世纪英国归纳主义的代表

在《逻辑体系》1843年版以及后来诸版本中，穆勒以他的批评还击了他的论敌。在他一生的著作中，这部著作是不太温和而有较强硬态度的一部。到19世纪50年代写作自传时，他认为自己始终是在反对直觉主义，而直觉主义是“虚假教条和坏制度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观点在他晚年的写作中表述得更加有力。

## 4.2 激进的、经验主义的逻辑思想

《逻辑体系》是激进的、经验主义的。穆勒并不像我们那样使用“经验论”一词，在他的词汇里“经验论”意味着不以科学原理为指导的观察方式。但是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经验，穆勒也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经验，因此他被归属于从洛克和休谟到罗素都劳作于其中的英国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穆勒对这个传统特殊的贡献是他试图使激进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式的经验主义与建立在牛顿物理学范式之上的社会科学观念结合起来。从某一方面他不得不强调说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感官的明证，另一方面他试图指出所有的科学门类都趋向古典物理学的抽象性和推理性。

经验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认为命题所描述的东西都是孤立的，我们不可能从中学习到任何东西。当我们用某一类的名字称呼一个对象时，比如说一把椅子，我们并没有对椅子的本质作任何描述，因为这只是把某些事物看成一类的一般性名称。穆勒否认三段论是导出有关未知事物知识的一种手段。如“人皆有死，苏

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这样一种三段论的典型形式，其自身证明不了任何事情。我们所需的全部知识（比如上述关于人终有一死的知识）本来就在大前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非真的从大、小前提推出苏格拉底之死，我们的推论在大前提中就已经终止。从大量的个体实例中我们观察到了很多人都已经死去，然后由此推出很多人终有一死这个结论。所以，所有推理都是由特殊事件到特殊结论。穆勒称，普通人在不借助三段论推理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复杂操作的高超技术，这是显而易见的。原始人能准确无误地把标枪投向他的猎物，这一技能的获得来自先前大量的实验，他们肯定未曾把这种结果构造成书面的公理或规则。他们的技能是由大量的个别事例推论而来的。而且，许多具有熟练手工技能的人也无须把他们所做的用一般命题表述出来。三段论的大前提是一种已经包含推理的一般命题，通过它我们把我们的经验简化为现成的缩写形式。如果三段论并不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呢？穆勒坚信它具有有一种功能，即作为一般命题正确性的间接保证。三段论是一个手段，它能够以一种方便的直接可用的形式保存我们的经验。在《逻辑体系》中，他只是用这种观点去解释在科学中我们如何获得确定性。他承认在复杂的推理过程中我们似乎是在用三段论的形式进行推论。穆勒指出，那种看上去像是三段论的推理其实只是可以还原为一些“标记”的归纳。这些标记只是使人不忘前事的一览表。如果我们的记忆足够好以至能够把大量细节整理有序，我们无须用一般命题就能够进行推理，然而记忆并不真的那样好，所以我们

19世纪英国归纳主义的代表



要借助“标记的标记”。这使得我们能够依赖先前的归纳，并且能够把本来是归纳性的和实验性的科学门类变成纯粹推理的科学。演绎并不是与归纳相对立的推理方式，而是它的极端形式。

对立并不在演绎和归纳之间，而是在演绎和实验之间。如果一项科学是实验性的，那就是说那些呈现出各种特殊面貌的新情况迫切需要一套新的观察和实验方式，即一种新型的归纳。如果一项科学是演绎性的，那结论是来自以归纳为基础而引出一种新型情况的步骤，并且审定这些新情况需要有那种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标记的标记。始终保持实验性的是那些还没有显示标记的标记的科学门类，如化学。另一方面，牛顿对行星运行的解释就是把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实验性的科学迅速转换为一种演绎科学，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范例。然而，象数学这样完全演绎性的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被认为是真的呢？它们真的不是必要的真理系统吗？尽管它丝毫不求助于经验和实验，穆勒说它们是从我们的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无法想象它们是假的仅仅是因为联想习惯的力量。如“一个圆的半径都相等”或“两条直线不能封闭一个空间”这样的命题是从我们的感性明证归纳而来的。所有数都必须是关于某物的数目，不存在作为抽象物的数目。数字10肯定意味着10个物体或10种声音或脉搏的10次跳动。穆勒得出结论说，那些所谓“精确科学”的高度精确性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实在对象（因为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直线，并且数目也不是实在对象），而是因为它们给出了精确的推理。

穆勒关于数学和几何学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逻辑



体系》一书中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后来逻辑和数学的发展使得人们不会再去认真讨论穆勒的错误。他把归纳定义为“发现并证实一般命题的活动”，他在描述一般命题中蕴涵的因果关系时，并不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自然力量，而视其为人们对预测的陈述。我们在自然中观察到其有序性，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多次出现后就预测它会再次出现。穆勒把这种预测称为“未经训练的聪明人对自然的认识”。这些“聪明人”会把小数量的巧合错当成一条规律。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因果的一致性和真正的规律呢？只有依靠经验，它告诉我们某些一致性比其他东西更可信赖。经过人工精致化了的经验使文明人感到需要区分巧合和真正的自然规律。可是什么是自然规律？穆勒认为自然规律就是最强的归纳，较弱的归纳则依靠它而生效。我们通过归纳发现原因。所谓的“原因”其实只不过是指那种一直不变的先行事件，我们所谓的“结果”只不过是指那种一直不变的后继事件。科学的任务就是从只意识到自然之有序性的弱归纳走向记录着一贯规律的强归纳。穆勒反对那种观念：即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着隐秘的力量；认为事物所产生的结果是事物属性的一部分，比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说煤产生的火比木头产生的火热。穆勒说，当一种能力被强加给事物从而成为某些结果的原因时，这种能力并不是存在于事物中的真实内容，而只是表达了我们对某种新环境下事物必将以某种方式活动的信任。他表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不必成为一个困难的或晦涩的问题。这也许能够说明他对社会生活事件和自然世界事物的混淆，对他来说好像我们理解社会和自然的方式完全没有

区别。然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我们都有必要在一个事件杂乱的先行条件中区分本质的东西和伴随其产生的偶然的東西。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对于一个事件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穆勒对原因的理解如此宽泛，涵盖了全部先行条件，结果它对解释人类事态来说过于笨拙，对于解释自然事件来说又过于宽泛。

穆勒论述道，我们所谓的一个事件的原因在实际上是更复杂的，它是全部条件的总汇，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纠缠在一起呈现给我们，结果总是紧随其后。但是就人类行为的范围而言，我们习惯于孤立某一因素，或视其为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的因素，这难道不比穆勒所考虑的更广泛吗？穆勒认为，除了对先行事件和结果的了解，我们不能对原因有其他理解，这种教条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它似乎没有考虑到人类动机，并且低估了个体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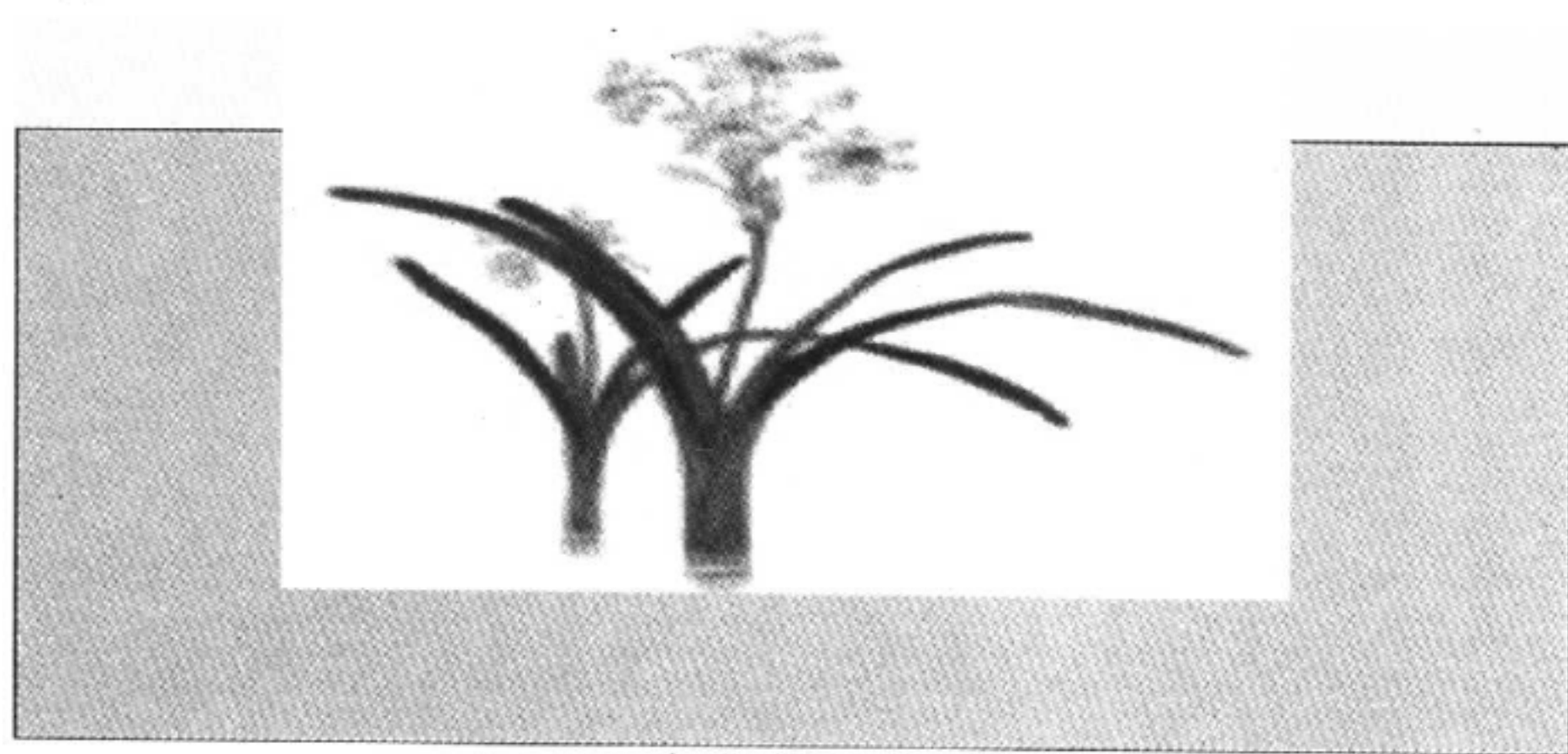
穆勒丰富了归纳法，提高了归纳法在逻辑中的地位。这是他在逻辑发展史上的重要功绩。但他在对待归纳法的态度上，表现出矛盾性。他常常夸大这些方法的作用，说任何一种知识都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但他又认为，在探究复杂的因果联系时，归纳法是不适用的，而需要使用假说方法。所以，他认为像“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这样的推理，是一个循环论证。他力图证明三段论是像类比那样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极力要把演绎法化归为归纳法。由于19世纪数学和物理学的极大发展，穆勒在他的著作中，也承认自然科学趋向于越来越多地应用演绎推理。19世纪末以来，概率论在归纳法研究中日益占重要地位，而穆勒的“确实而普遍”的归纳方法的研究，无明显进展。

19世纪英国归纳主义的代表

John  
Stuart  
Mill

5.

# 西方经济学 的首次综合者









## 5.1 19 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学 圣经：《政治经济学原理》

约翰·穆勒作为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 1848 年发表了他名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以下简称《原理》）。该书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 19 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一本无可争议的经济学圣经，曾长期被欧美各国大学用作经济学的基础教科书，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三次大的综合中的首次综合。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所谓“边际主义革命”对这本书中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严重地动摇了它的权威地位。但只是在 1890 年，马歇尔（Maxieer, 1842 ~ 1924）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它的地位才完全为后者所代替。穆勒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与那些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穆勒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和不公平，他没有忽视工人阶级的要求，也不反对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也认为，把穆勒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们摆在一起，好像是不公平的。

穆勒经济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折中调和。他自认为《原理》只是祖述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 1790）和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的著作。在导言中，他说，他的目的只是在于写一本适应当时时代更广泛的知识和新

西方经济学的首次综合者

John  
Stuart  
Mill

进的思想的“现代《国富论》”。对于李嘉图，穆勒认为他只是对其学说作一些补充或引申。该书出版之前，他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怀疑在这本书中，任何一个思想皆来自他（李嘉图）的学说和推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者不完全承认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虽然《原理》的确祖述了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原理》，但恰恰是在结合现代广泛的知识和新近的思想对旧理论加以补充、引申时，穆勒提出了许多他自己的意见。然而，他们却也不能不承认穆勒的意见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综合物。《原理》混合了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的和以后种种反古典的经济思想。穆勒的《原理》在学术界无疑享有持久地位，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依赖的那些真理。

对于穆勒经济理论公认的调和折衷主义特征，追随者认为，这一特征标志着《原理》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总结了从亚当·斯密起到19世纪中叶大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批判者则认为，穆勒经济学的调和折中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宣告。穆勒的著作在李嘉图去世30年后才问世，并且该书在他本人去世之前再版了7次，在这期间，李嘉图所作的预见已被全盘否定，但穆勒并没有给这个理论注入他那个时代的新内容，他仍然